

新中国成立初期召开的两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 韩晓青

1951年5月、1954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和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相继召开。随着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召开，党的宣传工作实现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适应新民主主义纲领方针的宣传，向用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转变。

健全宣传部门工作机构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宣传部门面临机构设置不完备、宣传系统干部缺乏等一系列问题。为了适应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以及进行大规模有计划建设，客观上要求有系统地建立和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健全党的宣传工作机构。

为了明晰和完善宣传部门的机构设置，1949年11月1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关于宣传部工作情况及机构设置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把宣传部重新健全起来，成为今后的重要工作。之后经过中央开会讨论，拟定了中宣部的机构设置方案。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宣传部门的干部是党的宣传事业的骨干。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宣传部门的干部配备严重不足。1953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南局批发广西省委关于宣传工作组织建设问题的报告，指出当时全国各地宣传干部的数额很大，据调查，全国约有四分之一的县还没有配备宣传部长。中央要求根据以上情况及广西的报告，急需迅速将宣传干部配齐，并将中央局、分局、省市宣传部的编制建立与充实起来。

随着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和机构的逐步健全，在中央人民政府层面设置了专门管理文教工作的行政部门。为了厘清党的宣传部门和政府文教部门的工作职责，中共中央在1949年12月5日发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党的文化教育工作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全国的文化教育行政的工作，此后均应由中央政府文教部门来管理，以便党的中央宣传部和各级宣传部能够摆脱行政事务，集中注意于党内外思想斗争，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领导和党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制定。这样就明晰了党的宣传部门和政府文教部门各自的工作职责，有利于其各自作用的发挥。

党的宣传部门和政府文教部门的分工各有不同，但依然贯彻了党管干部的原则。1954年4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试行党的各级宣传部管理文教干部的实施方案（草案）的通知》，要求各地在短期内将省市以上宣传部的干部管理机构建立起来，并根据具体情况，逐步将文教干部交由宣传部管理。《方案（草案）》还规定了各级宣传部管理文教干部的基本任务。1955年召开的文教干部工作会

议，对管理文教干部的范围、职务名称等作了具体规定。

召开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1951年5月7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党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后为研究和制定宣传工作方针政策而召开的首次全国性的宣传工作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在全国胜利以后，针对当时宣传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也就是在长期的紧张的战争环境中造成的宣传工作的经常性、系统性和深刻性不足，着重讨论和解决了四个问题：把党的群众宣传工作经常化、整顿党内外政治教育工作、加强党对思想工作的领导、改善党对宣传教育工作的管理和党的宣传教育机构。

5月23日，大会闭幕。刘少奇作了题为《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的总结报告。他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列主义的胜利这个角度，高度评价了我们党过去的宣传工作。对于新形势、新条件下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刘少奇指出首先就要在思想上打底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教育自己和全国的人民。对于宣传工作与中心工作的关系，刘少奇指出我们的宣传工作是不能离开当前的中心工作的，并且是为了保证各项中心工作的完成的。宣传工作必须与各级党委所定下来的中心工作密切配合，离开了党的中心工作，宣传工作就会失败。但我们党的宣传工作不止是搞当前的时事政策宣传，而且要作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

这次宣传工作会议，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关于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决议》和《关于加强工农读物的出版工作的决定》两个文件，确定了党在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时期宣传思想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推动了各级党的领导机关把向党内外进行马列主义的教育当作一项重要工作，并和党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进行。

召开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随着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党在1953年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并把这些总路线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指针。党的宣传工作的重点也随之发生变化，必须从适应新民主主义纲领方针的宣传，向用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1954年5月5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运动的经验，特别是总结1954年冬1955年春结合计划购粮、互助合作、准备春耕等工作对农村党员和群众进行的关于总路线宣传教育工作的经验，制订在当前总路线宣传的基础上进一步整顿和改进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办法。

5月7日，中央宣传部部长吕仲勋作了题为《党的宣传工作为贯彻党的总路线和四中全会决议而斗争》的报告，报告总结了1951年5月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以来宣传工作取得的成绩，强调：党的宣传工作在目前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实现党的总路线和党的四中全会的决议而斗争。党的宣传工作必须为贯彻党的总路线而斗争，党关于总路线的宣传首先要使全党的思想在新的水平上统一起来，使全体党员对自己的工作得到新的出发点。

5月27日，吕仲勋作大会总结，指出主要收获是：第一，解决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第二，对我们宣传工作的思想作风进行了一次比较深入的检查和整顿；第三，依靠集体经验和智慧，充实和修改了两个决议草案和总结报告。

这次会议总结了1951年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3年来的经验，确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来教育全党和人民群众，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实现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的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讨论通过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关于加强党在农村中的宣传工作的指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顺利实现了第一次重大转变，即由过去着重于新民主主义纲领和方针政策宣传，配合各方面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进行思想工作，转向用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来宣传教育全国人民，统一了思想，为实现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两次保卫战千古传雄风——岱崮保卫战纪念碑碑文敬读

□ 刘泽峰

在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岱崮镇的岱崮之上，有一座八角双层碑亭，碑亭为青白色调，庄重肃穆、简洁大方，名为“英凯亭”，寓意英雄凯旋之地。亭内坐落着岱崮保卫战纪念碑。纪念碑碑体采用青石石材，高1.943米，寓意1943年岱崮保卫战第一次打响。纪念碑正面为“岱崮保卫战纪念碑”字样，背面镌刻着碑文，记录着两次岱崮保卫战主要过程和重要成果。碑文如下：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岱崮群崮，耸屏列嶂。岱崮地理，天下无双。两次岱崮保卫战，凭地之奇险，我军勇士居高临下，英勇顽强，浴血守阵地，舍身斗强梁。以少胜多，创战争奇迹，铸历史辉煌。

1943年11月13日，第一次岱崮保卫战打响。八路军鲁中军分区八连93名勇士依崮而战，抗击日伪军一千余人的进攻。天上飞机、地上重炮地毯式轰炸，天摇地晃；燃烧弹、瓦斯弹喷烟吐火，石飞土扬。日军丧心病狂，威逼老、幼、妇喊话劝降。连长冯化德振臂高呼：“只有打胜仗的八路军，没有投降的八路军！”声震敌胆，群山回荡。27日，任务完成，八连官兵午夜突围。15天枪林弹雨，崮顶夷平，草木皆光。八连以牺牲2人、伤7人的代价，毙伤日伪军300余名，有力地配合了外线作战。为此，八路军山东军区罗荣桓司令员颁布嘉奖，授予八连“岱崮连”称号。

第二次岱崮保卫战于1947年6月26日开始，8月10日结束，历时42天，鲁中军区后勤监护营一连107名官兵参战，阻挡了国民党军两个师、一个旅的进攻，使敌人北上寻我主力作战的阴谋落空。战斗残酷激烈，敌人出动十余架战斗机、轰炸机轮番进攻，大炮密集轰炸，崮顶被削去20多厘米，浮土盈尺。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敌组织五次集团冲锋和几十次一般性进攻，真可谓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其间，我军多次主动出击，趁夜色，袭敌扰敌，直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草木皆兵。此战，一连牺牲4人，毙敌一副团长及毙伤敌人250余名。战后，鲁中军区授予一连“第二岱崮连”称号，并颁发“英勇顽强岱崮连”锦旗一面。

岱崮巍峨，胜败之凭。人心背向，系衰系兴。两次岱崮保卫战中，当地民众积极参战，报信带路，送粮送羊，军民并肩，患难与共。得天时地利人和，两次岱崮保卫战大获全胜。

抚今追昔，去而益咏。两次岱崮保卫战，精神今犹在，千古传雄风。为慰先烈英灵，彰前辈伟绩，激我侨豪情，于战地立碑建亭。在这片血染的热土上，蒙阴人民将奋发蹈厉，继往开来，为打造江北最美乡村，再立新功。（撰文 李大晋）

中共蒙阴县委

蒙阴县人民政府

公元二〇一三年十月一日

碑文语言凝练、朗朗上口，描述了两战岱崮保卫战的基本经过和取得的以少胜多的重要战果，歌颂了我军的英勇顽强和沂蒙老区人民与人民军队结成的鱼水深情，读来备受鼓舞、感触良多。

可歌可泣英雄崮

沂蒙山区流传着“沂蒙七十二崮，崮崮有故事”的说法。位于蒙阴县岱崮镇的南、北岱崮，相距约一公里，形状相似，崮顶均为圆形，四周壁如刀削，远看宛似巨人头上的一项帽子。因在晴朗的日子站在崮顶可望见泰山，又称望岱崮。

1943年11月，日寇从临沂、临朐、莱芜、蒙阴、沂水等地纠集精锐部队和大批伪军，准备对我鲁中抗日根据地“扫荡”。地势险要的南北岱崮，处于敌人进犯沂蒙山区腹地的咽喉。军区首长决定，以鲁中第二军分区十一团八连少数兵

陕甘宁边区如何突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 宋 斌

央直属机关纺线比赛中被评为纺线能手；朱德组织一个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门前开垦了三亩荒地。他们的事迹鼓舞了广大军民，边区机关、部队、工厂、学校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把昔日荒凉之地变成了“粮食堆满仓，麦田翻金浪，猪牛羊肥壮”的“陕北好江南”。据统计，1941年边区粮食产量只有45.6万石，1943年达到181.2万石，1944年又增至200万石，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并有结余。

精兵简政，节省民力。陕甘宁边区是当时中国革命中心，这里不仅汇聚众多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驻扎着留守保卫部队，还吸引了大量从全国各地前来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同时，陕甘宁边区也是一个经济落后、民力有限的地方，数量庞大的非生产人员远远超过边区负担能力。一般来说，非生产人员比例超过2%即属特别困难，但1941年边区非生产人员高达7.3万人，占总人口的5.37%，“鱼大水小”的矛盾非常突出。

1941年底，民主人士李鼎铭等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议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实施。1941年12月，边区整编委员会规定：政府一级各厅、处、院缩减1/3，八路军留守兵团转到生产战线。这次精简裁撤合并机构百余处，精简人员1598名。1942年6月，边区政务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再次紧缩机构、裁减人员，充实到县级以上

府。1942年12月，毛泽东提出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拉开第三次精兵简政序幕。1944年初，精兵简政基本完成。边区政权系统减少1.3万人，部队人数降到边区总人数2%以下，农民负担大为减轻。

稳定金融，抑制通胀。统一战线建立后，为适应全民抗战需要，陕甘宁边区宣布法币为流通货币，边区银行发行小额光华代价券作为找零辅币。皖南事变后，边区外援断绝，不得不大量发行自己的货币。1941年2月，边区银行正式宣布停止法币流通，开始发行边币，当年就发行2306万元，流通中的货币量激增。由于国民党封锁，流入物资大量减少，造成边区物资奇缺、物价暴涨，法币通过黑市大肆侵入边区。

为抑制通胀、稳定金融秩序，边区采取了多项措施：一是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统一领导边区财经工作，加大对生产和贸易扶持力度；二是利用发展生产所得物资，在一定范围实行实物配给制，减少开支，降低边币增发压力；三是支持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采用随行就市利率，引导闲散资金投入生产领域。这些应对措施产生了积极作用，边币本地购买力逐渐走强，边区金融市场稳定下来，物价也趋向正常。

抓住漏洞，扩大贸易。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虽然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屯兵50万，修建上万个碉堡，对边区进行严格经济封锁，但不能完全断绝贸易往来。国民党



始固守南北岱崮阵地。保卫战持续了42天，最终以较小伤亡成功打退了4000多名国民党军队的多次进攻，累计毙伤敌副团长吴开先以下250余人，最后迫使敌人狼狈撤走。不久，山东军区授予守崮部队英勇顽强“第二岱崮连”荣誉称号。

军民鱼水铸深情

两次岱崮保卫战既是我军顽强奋战以少胜多的重要范例，也是人民战争取得的重要胜利。在两次战役中，沂蒙老区人民发扬“一切为了革命胜利”的精神，将优秀儿女送往前线，广大妇女肩挑后勤保障的重担，救伤员、筹粮草，地方民兵全力配合主力作战，埋地雷、搜情报。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尤其是在第一次岱崮保卫战中日本鬼子投掷毒气弹，用刺刀逼迫当地的老人、妇女、小孩上山劝降等惨无人道之举，沂蒙老区人民宁死不屈，使敌人的阴谋最终落空，为保卫战的最终胜利筑起了坚强堡垒。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中央文件和上级命令很严，但下级执行不严，商人可以通过夜间偷越封锁线、购买其税务缉私人员等方式，设法将商品运进边区。1940年7月，延安兵工厂造子弹急需到外地采购铅锡和氯化钾。边区政府委托延安商会的四户商人到西安购买这些军用物资。他们到西安后，首先购买几十篓酱菜，之后将买到的铅锡和氯化钾装到酱菜篓底下往回运。沿途经过国民党五道关卡，但因给了工作人员好处，一一顺利通过。如此往返三趟，共运回一万多斤铅锡和氯化钾，顺利解决了延安兵工厂急需的子弹原料。据统计，仅1941年，边区利用国民党各关卡间内部矛盾，进口了价值10800万边币的货物，种类包括洋纱、布匹、棉花、纸张、文具、颜料等。

由于在国统区购买物资要以法币支付，国民党政府又停发了八路军薪饷，因此，推动边区货物出口换取法币，是扩大进口的前提和基础。当时边区最具优势的出口商品是食盐。边区西北部的三边地区盛产食盐，且物美价廉，甘肃东部、陕西关中均依赖边区食盐。国民党政府曾想用青海盐取代边区盐，但因路途遥远，成本又高，以至连封锁部队食盐都无法保障。在此情况下，不管国民党如何封锁，边区盐总能通过各种渠道畅销不衰。1938年边区盐运销量只有7万驮，1941年猛增至30万驮，食盐出口一度占边区出口额的90%，食盐税收长期占边区工商税收的50%以上。以食盐为代表的货物出口，在平衡边区贸易特别是打破经济封锁、换取紧缺物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